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追根溯源】	文革的制度根源与其导致的制度变化	许成钢
【往事非烟】	难忘的燕园·1969年（上）	吴 琼
【痛定思痛】	反思文革是全社会的救赎	田文昌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追根溯源】

文革的制度根源与其导致的制度变化

· 许成钢 ·

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使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典型极权制最终演变成了分权式极权制。典型极权制是由列宁初创、斯大林完善而最终确立的，是斯大林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大量政治学和历史学文献清楚证实，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极权制度都源于对苏俄制度的模仿。二次大战后，在所有苏联红军占领的中东欧国家，也都建立了这样的极权制。中国共产党自初建就是在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直接指导和各种支持下，一步一步，从党到军、到政、再到经，建立、组织、发展起来的。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在经过党军政经全面复制苏联模式的巨大努力下，在苏联的全面指导、帮助下，中国建立起了完整的典型极权制。

其后经历大跃进运动和文革，典型极权制被分权式极权制（全称为向地方分权式的极权主义制）取而代之。所谓分权式极权制，在政治和权力结构方面表现为领袖个人的极端的集权；在经济和行政操作方面，则表现为向地方大规模地分权。这种制度大幅削弱了中央及各级官僚机构的力量，把典型极权制中尚存的最低限度的党内制衡也几乎清除殆尽。这使得领袖掌控更大更完整的个人权力。在中央及各级官僚机构被大幅度削弱，市场被全面关闭，中央计划无法操作的条件下，这个制度中的经济和行政安排只能依赖自给自足、能够自我调控、具有相当自主权的基层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极端的集权与行政、经济的向地方分权，这两者之间是互为条件，相互支撑，高度互补的关系。

◇ 典型极权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

认识极权制是认识文革的基础。极权制一定是一党制，但一党制不一定是极权制（世界上多数一党统治的国家都不是极权制，而是威权制）。政治学文献里，把极权制总结为以下五个基本特点。典型极权制与分权式极权制都共同具有这些特点。第一，党完全垄断国家，完全垄断政府。换言之，党和政府的官僚体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第二，党对国家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武装力量包括警察和军队，以及所有其他武装力量。以此为基础，典型极权制的国家用警察来控制社会。

第三，在经济方面，党对经济全面地垄断性的控制。全面垄断性的控制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苏联的方式，即全面的企业国有制以及在党的完全控制下的农业的集体所有制。由于党和政府不分，所有的企业既是国（集体）有的，也是党有的。第二类是纳粹和法西斯的方式，即党主要通过控制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而不一定是产权，全面控制经济。

第四，党全面地、绝对地、排他性地控制意识形态。这一点是极权制和非极权制之间非常突出的基本差别。所有极权主义政党都有很强硬的，绝对排他性的，处于垄断地位的意识形态。垄断地位不仅意味着党控制所有的大众传媒，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其他一切出版物，而且意味着党对意识形态的内容有绝对的排他性的解释权。比如，党有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容置疑的解释。任何与党不同的对意识形态的解释，都不能容忍，要受到党的严惩，例如被冠以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足以致命的罪名。对意识形态的垄断意味着禁止辩论，意味着用暴力压制不同意见。党对意识形态的垄断，是党制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工具和条件。事实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既是文化革命重要的起因，也是其重要的结果。

极权制的第五个特征是党全面控制社会的所有组织，包括所有非政府组织（NGO），所有宗教组织，非宗教组织。这种控制深入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城市中每一个街道都有街道委员会，街道委员会的核心是党组织。农村每个村必须接受村党支部的领导。每一个工厂的每一个车间都有党的组织，每一个人民公社的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组织。不允许全社会里，有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党的组织。所有的党组织的首长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党用这个办法来保证对社会中所有人的所有活动的控制。这是极权主义最基本的特点。

虽然典型极权制与分权式极权制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由超人的领袖领导的，自上而下组织的，贯穿全社会、统治全社会的官僚组织，但是如何来具体的组织和运转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这些方面，典型极权制与分权式极权制有着基本差别。在典型极权制下，党一政官僚体制的核心是按照专业化的原则组织。在分权式极权制下，党一政官僚体制的核心是地方政治、经济。

◇ 文革前：典型极权制在中国全面建立

极权主义制度既不是中国传统制度，也不是在中国纯自发产生的制度。因此它不是传统的“中国特色”。典型极权制在中国全面建立始于1949年。全面倒向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学习苏共，逐渐彻底地控制了中国的所有组织，包括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建立极权制的第一步是控制所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1949年召开的政协会议，发表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说明》，关于多党制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正式许诺。尽管如此，这些民主党派仍暂时被允许独立存在。但在不久之后的反右运动中，所有坚持政党原则的民主党派的领导和骨干人物都被打成了右派。任何一个重提“多党制”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人，无论是民主党派人士，是共产党干部，还是知识分子，都被打成右派。通过反右运动，“多党制”已经被正式禁止。这些“民主党”已经不再是通常意义的政党。同时，中国共产党逐渐地全面控制了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所有的学校、科研机构、医院和其他非盈利组织、宗教机构等。不经过共产党批准建立任何组织为非法，甚至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第二，中国共产党直接控制了政府的所有部门，包括行政、军事、司法。

第三，通过国有化和集体化，全面改变了经济的所有制，以此控制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但有一个特例，就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按照1954年宪法，民族资产阶级仍然被允许存在，即一部分的企业仍然是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但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民族资产阶级逐渐丧失了这些企业的产权。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的企业中，也必须接受共产党的控制，包括在这些企业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由此，在中国建立起了典型极权制。党对整个社会形成全面的控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的方方面面。“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是194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多党制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用来描述国民党的词。但这是对典型极权制更准确地描述。

建立、巩固、发展如此全面和严密控制的制度，必须依赖超强的激励机制。其中既包括对其积极参与者的强烈的诱惑，也包括让所有可能的怀疑者、挑战者和反对者感受到巨大的恐惧。最大的诱惑是把个人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与其升迁紧密挂钩。而恐惧则针对这个制度中的所有人的可能的不忠诚行为。任何人，无论其政治社会地位，对这个主义、这个党、这个领袖，持有任何不同的看法，哪怕表达的是技术细节上的“不同政见”（例如反对建造三门峡大坝，反对苏式高等教育大纲等），就可能沦为反党、反革命份子。而这个“罪行”将受到极其严重的惩罚，甚至极刑。这种激励机制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经在苏联帮助下建立并成熟。现在，这种党内制度被扩大到了全社会。

在中国建立典型极权制的过程中，苏联的援助起了巨大的基础性的作用。除政治文化等因素外，世界上的极权制总是与现代工业化的基础密切相关的。最初产生极权制的苏俄、德、意，都是比中国发达得多的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几个国家之一，人均GDP只有世界先进水平的1/20，大部分的中国人生活在近乎原始状态，汲汲于生存。如此落后的经济水平难以支撑典型极权制。从近乎原始的经济水平到在短短几年时间建立起现代极权制度，苏联的政治军事经济援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十年代苏联对华的156个重大援助项目，使得中国在短期内快速形成了自己的工业化经济体系。但比物质技术援助更重要的是，除了大批技术和设备进入中国，中共还邀请了大批各个领域的苏联专家，试图系统地从制度上把中国改造成苏联。来自政府、法律、经济、管理、科学、工程等领域的苏联专家，指导甚至直接介入中国制度的建立，并深刻影响中央所有领域的各部门和重要的经济领域。

所有极权制都高度注重培养忠诚的专门人才。中国的高等级教育也按照苏联极权制度的方式，改造重组。苏联专家们在指导原则上，在制度上，甚至直接在人事上，决定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如以苏联模式推进的全国院系调整）和科研制度（如以苏联模式改造中国科学院）。以清华大学的改造为例。改造前的老清华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基本上教授治校（国内其他顶尖大学与此相似），是一所完整的综合性大学，涵盖人文、社科、科学、工程、医学、法律等所有领域。多数教授都是从美国、西欧留学回来的，在很多领域都培养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栋梁之材，在一些领域的水平甚至超过当时与西方隔绝的苏联。但自从1952年执行“以苏联为师”的院系调整以后，大学不再有自主权，教授不再治校。学校越来越走到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反面。按照自上而下的苏式计划，不仅人文社科被全部裁免，即便在理工方面，也把基本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数学都从清华裁减出去。原本综合性的清华大学被肢解成为一个工程学校，变成了狭窄的“工程师的摇篮”。

在反右运动中，所有寻求恢复教授治校，或对全盘苏化治学持不同见解的教授们，全部被打成右派。大批清华最优秀的教授被打成右派（全校共有 5 7 1 名教师被打成右派）。反右巩固了统治清华大学的极权制度。从此，不仅清华，不仅大学，所有学校都要培养“党的驯服工具”（刘少奇语），都要把尽量多的人改造成革命的“螺丝钉”（雷锋语）。而如此培养的原子化的群众正是之后的文革的基础。最可悲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靠打击教授来巩固自己统治的清华校党委领导，在文革中被清华“自发”的革命群众运动打倒，成为全国最早被打倒的“统治学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一。把清华大学作为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反映的更大图像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所为和下场与清华校党委领导何其相似。这种相似不是偶然，而是同一制度所然。

◇ 文革与分权式极权制

文化大革命从政治、经济制度上破坏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的一种极权主义制度，代之以分权式极权制。实际上，这个破坏和取代始于 1 9 5 8 年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是建立了典型极权制后的第一次系统性的重大体制变化。它是文化革命的前奏，是破坏典型极权制建立分权式极权制的第一步。

大跃进集中于削弱典型极权制中央各部的行政和经济权力，同时在行政和经济方面向地方大规模放权。将中央直接控制的大部分企业转移到地方。经过一年大跃进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就从 1 9 5 8 年的约 8 0 % 降到了 1 9 5 9 年的 2 5 %。由此，在中央严格控制政治和人事的条件下，建立起在行政和经济上相当自治和相对自给自足的地方基层。在这种中央—地方制度中，所谓的中央计划被基本破坏。此后，除了几百个非常粗旷的全国性指标外，本质上并不存在可以操作的，中央对经济的具体的计划。所谓的“中央计划”是以地方计划为基础，由上层政府协调补充的官僚制度。相比之下，在典型极权制的、基本消灭了市场经济的苏联，中央直接计划和控制大约 1 2 0 万个具体的计划指标。这些指标之间涉及极其复杂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位高权重的领袖，也必须依赖大量握有实权的技术官僚。因此，中央计划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经济制度。其组织形式有重要的政治含义。斯大林虽然从上到下肃清了数以百万计的政敌，在消灭了所有政治制衡的典型极权制里，至少在技术层面上，他对国家的控制仍然要依赖技术官僚，仍然要受到中央官僚机构的限制。

大跃进运动的政治实质是铲除中央计划，增强地方力量，以削弱中央官僚。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在模仿中国帝制的统治制度。毛泽东在 1 9 5 8 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中秦始皇指的就是帝制传统（而所谓马克思则指从苏联批发来的典型极权主义制度）。大跃进同时消灭市场经济（反资本主义）和破坏计划经济，最终以空前的大饥荒灾难而告终结。救灾时期的所谓“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及之后以“四清”方式展开的阶级斗争，都是为了巩固大跃进建立的制度，有些更务实，有些更激进。

在破坏了中央计划的制度中，领袖的政治权力和权威变得更强大。党由领袖自己的派别统治。不在领袖的派别中的其他党员，轻则受排斥，重则变成反党集团，属于被整肃被打倒的对象。党把整个社会对领袖的忠诚度推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领袖变成了神。领袖成了“大救星”，成了“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与马克思主义反对存在救世主的基本立场正好相反。原本相对抽象的党的意识形态，其内涵变得越来越窄。党的主义由领袖的路线来定义。对主义的其他解释变成反党路线。这说明，在极权制建立后，极权主义的基本成分——意识形态并不总有实质含义，其中许多内容是为专制权力服务的。群众对领袖的迷信的重要性超过意识形态。而高度的这种迷信正是文革重要的基础之一。

与大跃进运动相比，文革是以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方式（如文革时期最常引用的毛的语言所宣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制度上彻底破坏典型极权制的“革命”。通过这场革命，文革最终铲除了典型极权制的残余，清除了政治反对势力，建立了完整彻底的分权式极权制。

文革系统性地破坏党政官僚机构，尤其是最上层的官僚机构，这个观点在研究文革的文献里受到相当充分的重视。但是，在消灭了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作为一个可以操作的制度，向地方放权是与削弱中央权力互补的，不可或缺的一面。除了行政和经济的操作方面的重要性，从政治制度层面，架空中央各部门权力，向地方放实权，是巩固领袖个人权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因为，在个人迷信盛行的条件下，同地方政府的权力相比，领袖的权力是绝对的。而任何有实权的中央部门，都是潜在的挑战领袖政治权力的对手。所以，通过分权式极权制，从制度上极大地削弱和架空中央各部门，从而在制度上保证领袖的权力是无法挑战的。

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和1975年通过的宪法正式以党、政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分权式极权制。在分权式极权制中，官僚机构大幅度扁平化。除直接与领袖相关的权力圈子外，中央官僚机构所剩无几。在分权式极权制得到巩固的1975年，中央财政的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不到12%。没有人，没有机构，在任何方面拥有权力和资源能够挑战领袖。地方基层由无限忠于领袖的革命者掌权。在理想状态下，领袖通过“思想”、“口号”，无需过问技术细节，几乎可以直接领导无限忠于他的自给自足的地方基层。

值得深思的是，文革留下的制度遗产分权式极权制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历经几十年的改革，在这个制度遗产基础上，中国的制度演变为分权式维权制（相关分析有待下文）。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路径和性质，但时至今日我们对此还缺乏共识。一些造成文革的制度条件仍然遗留在当今的制度中。类似于文革的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今后的制度改革。

注：作者感谢黄磊和史颖波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的帮助。

更新于2016年10月24日

□ 原载《金融时报》中文网

~~~~~

## 【往事非烟】

难忘的燕园·1969年（上）

· 吴 琼 ·

（作者简介：吴琼，1944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哲学系1968年本科毕业，1981年研究生毕业，中国哲学史硕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处长、编审、退休干部。）

现如今，我已经过了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以往经历的许多事情都难以忘怀，但最难忘的，还是在“文革”时期1969年前后，在北京大学度过的那一段还没有离开母校的特殊日子。那时，我只有二十四、五岁，正好处于一个人的青春期，所谓人生的“黄金时代”。

## 第一章 毕业前夕，被押进东语楼“监管所”

1968年8月，在毛泽东接见全国造反派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后，北京大学的武斗结束，由4587部队和北京618厂工人组成的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燕园，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北大展开。同年10月，军工宣队通知1968届本科生毕业，一律分配到全国各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改造从旧学校带来的资产阶级旧思想。本来，在毕业分配时，我已经报名，自愿去西北落后、贫穷的宁夏隆德工作，不料，就在还没有领到派遣证的一天傍晚，忽然接到哲学系军工宣队办公室的通知，要我去学生宿舍38楼206寝室，接受“政治审查”。

38楼206室当时的气氛一改往日的文明和宁静，变得杀气腾腾，十分紧张。只见一张书桌横放在寝室中央，在强灯光的照耀下，书桌上放有非常引人注目的、两大摞一尺多高鼓鼓囊囊的、浅黄色的“卷宗”袋。身体又高又瘦、身穿一身黑衣黑裤、平日不苟言笑的618厂工人李元和师傅，整个身子朝前倾，双肩、双手支撑在书桌上的两大摞“卷宗”袋之间，两眼放射出凶狠目光。他劈头盖脸地对我呵斥道：“你就站着，不能坐下——看好！这两摞袋子里，装的都是哲学系和其他系师生揭发你的反革命罪行材料！”

接下来，他便向我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告诫我必须放弃侥幸心理，必须“竹筒倒豆子”，老老实实在交待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而在李元和的左右两侧，分别威武地站立有我的四位同班同学：其中左侧两位，居然是北大“文革”运动中与我的观点一致、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兵团”战友；右侧两位，则是与我的观点不一致、一直拥戴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成员。待李元和发言之后，上述四位同学马上加以配合。他们或者和颜悦色、娓娓动听地劝告我，最低限度也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放弃一切幻想，如实交待问题，以便按时毕业到工作岗位上去，获得一个不错的个人前途；或者，声称我的问题已经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不断地对我恐吓、威逼，甚至与李元和一起对我拍桌子瞪眼，走过来动手动脚，强迫我弯腰低头认罪……当时206寝室的那种情景，真像读者在一些电影和现代京戏中所欣赏过的戏剧性场面。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对这种遭遇的到来我早有精神准备，并不以为然。当时我想，该来的事情终于来了，躲也躲不开只能强硬对付。所以，无论这五位审讯者如何表演，怎样气急败坏，我的回答只有斩钉截铁的一句话：“我没有反革命罪行。”

审讯在继续，愈演愈烈。38楼二层楼道里鸦雀无声，似乎各个寝室里的同学们都在侧耳倾听……

我站立在那五位审讯者和那张横放的桌子之前的一小块地面上，不时微微眯起双眼，越过五位审讯者的头顶，遥望玻璃窗外阵阵寒风吹拂下不断摇曳的树枝头和路灯的光影，在自己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文学作品《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两位主人公——牛虻和伏契克的不屈形象……

这场突审，一直持续到晚间睡觉熄灯时间，才不得不结束。审讯者们一无所获。审讯结束前，倒是李元和的头上不断冒汗，他不断用一块白毛巾擦拭。他已经完全失去常态，对我大声咆哮道：“你说你根本没有反革命罪行？你没有？！你现在敢签字画押吗？——这里有笔和纸，料你也不敢！”

我走到桌子前，拿起笔来，在五位审讯者的包围、注目下，毫不犹疑地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我没有反革命罪行”八个大字，随后，签上我的姓名，以及年、月、日。

——整整一年之后，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又在解放军军工厂锻炼一年，走上了工作岗位。一次，我从自己所任教的河北衡水到北京探亲。一天中午，我在前门珠市口大街，遇到当年曾经参与审讯我的一位京籍同班同学。那时，耸人听闻的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还没有发生。这位昔日的“井冈山”战友，把我悄悄地拉到街头一角，神秘又带歉意地对我说：“知道吗？当时，206寝室那些‘卷宗’袋里，并没有揭发你的过硬材料，袋子里装的都是一些吓唬你、冒充揭发材料的过期报纸……”当我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不回置一语，只保持沉默。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践踏民主与法制的事情层出不穷，人们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类似事件既然不幸落到自己的头上，我能够说什么呢？

……1968届毕业生开始陆陆续续离开燕园，匆匆忙忙地奔赴全国各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了。而我，却不得不仍旧滞留在38楼206室，过着囚犯一样的日子，“政治审查”并没有结束。李元和代表军工宣队命令我：一不得打电话，二不准向外写信，三不得离开燕园一步；只准我在寝室里看《毛选》和报纸，闭门思过，继续交待问题。哲学系68届同学在离校前，有的人紧握我的手说：“挺住，挺住，一定要挺住——挺住就是胜利！”有的人找个借口，来到206室走一圈，非常忧郁地望一望我，点点头，就算告别了；还有京籍的两三个同学，悄悄记下我母亲家的在京地址，向我有什么要紧的话，可以由他们去转告——而我自己只能听天由命，无聊又忐忑不安地消磨时日。我还听说，军工宣队领导班子里，对处理我的问题颇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这个学生出身不错，又没有发现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何苦就这样把他扣住不放呢？但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有没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要等全校的“清队”运动全面展开以后再看，也许，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就会发现有严重问题。……就这样，到了10月末，事态竟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1968年的冬天比往年来的早些。10月末的一天上午，天气寒冷，从白天夜里开始，燕园里便开始落下初冬的第一场雪，不过，落下的并不是那种鹅毛大雪，而是像小米粒大小般的“沙沙”小雪。在一个参与过对我审讯、个头不高、还没有离校的同班同学的押送下，我冒着小雪从38楼走出来，肩上扛着铺盖卷，手上提着一个穷学生所有的全部不值钱的网兜、脸盆、生活用品，离开学生宿舍区，由南向北，穿过图书馆、办公楼，走进了北京大学西校门附近的东语楼——当时北大哲学系的“监管所”。

## 第二章 学习马列著作小组变成“反革命读书会”

那时的东语楼内，关押着哲学系几十个年龄不等、从60岁到20岁左右的男男女女，所谓的“走资派”、“黑帮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动学生”。他们统统集中关押在东语楼一层的西头，以一个洗手间为中心的几个大小不同的教室和房间里，接受“政治审查”。一间空荡荡的阶梯教室被用来充当审问室，每天从早到晚，就在这个阶梯教室的入口处最高一级阶梯的层面上审问犯人。看管犯人的红卫兵值班室，设在审讯室的对面，隔着楼道就是洗手间，红卫兵值班室是一个狭长的房间，驻有军工宣队所信任的哲学系69届和70届的本科生。我被押进与红卫兵值班室仅一墙之隔的一个教室里，在这个教室的地板上，铺有两张供犯人睡觉用的草垫子，临窗有一桌一椅，供审查对象写交待材料之用。

当我关上这个教室的门，把肩上扛着的铺盖卷放到一个草垫子上之后，转过身来，发现在临窗的另一个草垫子上，按照监管所的规定，端端正正坐着一个人。他是一位头发花白、戴着一付金丝眼镜、面目慈祥的先生。这位先生正是蜚声国内外的数理逻辑教授、英语非常好、过去被称为“燕京大学三大怪”之一、终生未婚的吴允曾先生。吴先生端坐在草垫子

上，头一动不动，用他那特有的、沉稳而又亲切的嗓音对我说道：“欢迎你来和我作伴儿。我被怀疑是个美国特务，你的罪名是什么？——我早就认识你，过去，全系师生开会唱革命歌曲时，总是你在台上指挥，指挥得不错。你还是‘井冈山兵团’《新北大报》的主编，‘新北大公社’《新北大》报的主编是宋一秀——两种观点对立的小报主编都出自哲学系。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你也许会在这里和我一起消磨一段时日……”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便和老实巴交、治学态度非常严谨、记忆力惊人、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逻辑学和计算机软件事业的吴允曾先生成了至交。在两个多月共处一室、朝夕相处的患难日子里，我得到过吴先生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一生难忘，现在每每想起来便热泪盈眶……

我到监管所后没过两三天，不知怎么得到的消息，我家的老五、老六，“文革”发生时还在上初三、初一的妹妹和大弟弟，匆匆忙忙来到东语楼探望，给我带来两条《恒大》牌香烟和10元钱。她们告诉我：还没有把我被关押的事让母亲知道，母亲的身体很好，不必挂念。她俩离开东语楼时，我把妹妹叫住，特别叮嘱她说：这件事务必不可让我的高中女同学马明明知道，要代我多看望她几次。妹妹含泪连连点头——因为，当时只有妹妹知道，我已经与马明明订婚，而马明明患有心脏病……

自从被关进东语楼之后，军工宣队便更换了审讯我的人。他比李元和年轻，也姓李，长得很结实，也是身穿黑衣黑裤，脚上总是穿着一双擦得贼亮的黑皮鞋。此人原来是618厂保卫科的一个干事。他每周两次坐在阶梯教室最高层一把宽大的椅子上，面对面地审问我。不过，李干事与工人李元和不同，他不像后者那样，在审讯我时不断地大喊大叫、威胁、咆哮，而是寡言少语，经常在审问我时故意停顿几次，有意识地让审讯冷一冷场，以便制造出一阵阵紧张的气氛，给我施加无形的精神压力；只有在审讯的关键时刻，他才从口中甩出一、两句十分刺耳、难听、气人的话。总之，他好像早已料到我不会松口，决不会承自己有“反革命言行”；他似乎在应付差事，每周只来审讯室和我见两次面，消遣消遣。

是的，俗话说的好：“咬人的狗并不叫”。阅历不深的我，可以说真是低估了这位618厂保卫科的小干事——到了1968年年底，我的案情突然有变，情况直转而下！

1968年最后一天的一大早，天还没亮，李干事打破常规，提前在东语楼阶梯教室突审我一次。这一次，他仍然没有收获。可是，在突审即将结束时，他的表现却与以往不同，态度相当诡异。他轻轻松松地舒展开身体，半坐半躺在那个椅子上，面部表情分明是朝我微微一笑，却又迅速收敛起笑容，“腾”地突然站起身来，举起右拳在我的鼻子前挥舞一下，咬牙切齿地叫嚣道：“好，好，好！！你的态度很好很好——既不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又不揭发别人，真有一股子别人没有的江湖义气，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硬汉子，大英雄啊！不过，我现在要严重警告你——你的事儿，很快就见分晓！”

他说完这番话，就夹着文件包扬长而去，把我丢给了值班的红卫兵。

那是1969年1月2日的上午。落下几天飘飘大雪的燕园里寒气逼人，但是空气清爽的很。所有古香古色的建筑物房顶上，还有高低大小不同的树木、灌木丛和地面上，都落下了厚厚的积雪。太阳出来了，照耀得人眼花缭乱。从东语楼通往南面学生宿舍区的大路和条条小路上，几乎见不到一个行人。大约上午9：30，李干事把我叫出东语楼，特别递给我一个又宽又大的棉口罩，叫我戴上，把脸遮住，然后，引领我往南走。他走在前，一个看押我的红卫兵走在后，把我夹在中间，一行三人踏着积雪，一直走到学生宿舍区的学四食堂。



进入食堂后，三个人都不声不响地背靠在食堂东墙靠窗的一排暖气片上。只见这个食堂已经布置成一个大規模的批斗会场，在食堂北墙一个个卖饭的窗口上方，展开一幅醒目的“批斗反革命分子XXX大会”的红色横幅标语，全校师生员工代表，包括驻校军工宣队队员，共约两千多人，早已坐在自带的方凳或椅子上，正等待批斗大会的召开。会场的气氛相当紧张，有一股子萧杀之气，无人说话。

批斗大会开始了。先是驻校军工宣队领导人讲话，他高调阐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北大“清队”运动的大好形势，向各系师生员工代表交待“清队”的方针政策，严厉警告那些还在负隅顽抗、暗藏的阶级敌人，必须无条件地交待自己的严重政治问题……随后，这场批斗大会的主要批斗对象上台发言，他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北大“文革”运动中同我的观点一致、个子矮小的外系同年级同学。这位外系同学用不断颤抖的手握着扩音话筒，慷慨激昂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声泪俱下地回顾自己苦难的出身和在党的关怀、教育下的成长过程。他痛心疾首地批判自己在任《新北大报》主编时，组织起一个“反革命读书会”的滔天罪行，此后，他又揭发另一个《新北大报》主编，如何猖狂地向他散布恶毒的“反革命言论”，他又如何向其他一些同学扩散了这些“反革命言论”。最后，他郑重其事地警告在场的北大师生员工代表，任何犯有同类罪行的反革命分子，都必须以他为榜样，效法于他，向军工宣队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严重问题……

这场批斗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场上真可谓群情激昂，严肃热烈，声讨声和口号声连接不断。最后，大会在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戴着口罩，遮住脸，背靠在热烘烘的暖气片上，我自始至终关注着大会进展，仔细辩听从扩音器传来的每一个声音。当那位自我揭发、批判的“井冈山”战友开始发言时，我并不感到新奇和诧异，因为，他“文革”时一直是燕园里的一个活跃人物，经常出现在大大小小的辩论会场，他的发言一贯高调，富有煽动性。然而，随着他在这场批斗会上发言的继续和深入，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尤其是，当他说《新北大报》编辑部里有一个“反革命读书会”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到他说的话不可思议，简直是海外奇谈！但是，当他提及《新北大报》另一个主编对他如何散布反革命言论时，刹那间，我们心房不由得一阵紧缩，继而“咚咚”地加快跳动，我一下子傻了眼——原来，他所揭发的那些对他散布的所谓“反革命言论”，其中的实质性部分是我，确确实实就是我本人，亲口对他说的话！

开过批斗大会，各系师生员工代表离开会场之后，我又被押回东语楼。在踏雪返回东语楼的一路上，我的心情变得极其恶劣，又气愤、又失落、又沮丧，坏得无以复加，以至于看到燕园里的一切景物——南阁，北阁，图书馆，办公楼，办公楼前那两根高高的汉白玉华表柱子，等等，我觉得它们统统都变了，变得歪歪扭扭，不像样子，一塌糊涂，甚至于燕园里的一木一草，乃至大地和天空，都改变了往日的颜色……

当回到东语楼的那间教室，李干事离开我以后，红卫兵把吴允曾先生叫到值班室，说了几句话。神色凝重的吴允曾先生返回房间，立刻为我从暖瓶里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他欠下身子，对坐在椅子上发呆的我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现在你要冷静，沉住气，不要多想，身体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可是，我却什么也听不进去。

是的，不错，现在要冷静，不要多想。可是，我能够冷静，能够不多想吗？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一直在回忆，判断，思索，忍不住一直想呵想呵，午饭和晚饭不吃，水也不喝一口，整整一天都在不断地想，以至于倒在草垫子上以后，还在思索。我一夜无眠。

我想到：“文革”时的《新北大报》编辑部共有六位编辑，大家分别来自哲学系、中文系、西语系、化学系，五个男生，一个女生，由揭发我的那个外系同学和我两个人担任主编。但是，活见鬼！我们从来没有组织过“反革命读书会”呀！如果说，我们六个人在一起认真读过书，那是真的。那是从1967年夏到1968年春，当1967年“一月革命”发生，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派夺上海市委的权以后；当江青号召“文攻武卫”，各地造反派和保守派展开武斗，全国大乱以后，众所周知，全国大多数的师生都厌倦了这种没有章法、乱哄哄、自相残杀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都变成了力图摆脱这种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的“逍遥派”。正是为了不虚度青春年华，认真学习那时还允许学习的书籍和知识，《新北大报》的六位编辑在北大28楼原编辑部的房间，自发地开始阅读并讨论马列著作。我们一共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五本著作，更何况我们在学习讨论中，只是讨论马列原著的内容，从来没有议论过毛泽东、中央文革和“文革”运动。这样的一个小学习马列著作小组，怎么一下子忽然变成了“反革命读书会”呢？

我还想到：如果说在那段时间和此后的一段时间，确实有议论毛泽东、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事情的存在，也不是发生在《新北大报》六位编辑学习讨论马列著作的时候。原来，从1966年底到1967年2月，因为我本人对这场“文革”和北大运动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感到奇怪、不可理解，为了弄清事实的原委和真相，我一方面阅读了一些马列、哲学、历史、政治书籍，另一方面，翻阅了收集来的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大量小报和材料，经过个人独立思考，并且结合自己的亲身见闻，于是，形成对建国以来直至“文革”运动的几点看法。我当时认为，第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对彭老总的那种批判、斗争和处理是不公正的、错误的；第二，1962年“七千人大会”纠正三年所谓的“自然灾害”政策错误，则是正确的，是不应该后来“炮打司令部”，以林彪取代刘少奇在党内位置的；第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说明在党内存在一条“左倾”路线，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当然要负错误路线的领导责任——由于在《新北大报》六位编辑学习讨论马列著作以后，编辑部有些杂事还需要两个主编处理；又由于那位外系主编多次声称，他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难以理解，例如，66年“五·二五”聂元梓贴大字报；“七·二五”江青在北大东操场讲话；67年上海“一月革命”夺权；“七·二〇”武汉事件；中央文革小组抛出“王关戚”后，又揪出“杨余付”等等。他多次央求我谈谈个人看法，加之，他一再向我表示：“我非常非常苦恼，寝食不安。无论是对是错，请务必谈谈你的看法，不成熟也可以。我一定保密，决不会对其他人讲——刀架在脖子上也绝对不会泄露出去……”。

于是，我就断断续续对这位外系同学，我自以为非常可靠、值得信任的“战友”谈了自己的看法，可是，我哪里会料到，到了军工宣队进校开展“清队”时，到了毕业前夕，这位当初信誓旦旦的“战友”，不但把我讲的一些违禁的话，作为“反革命言论”向专案组合盘端出，又在批斗大会上揭发、批判呢？

随后，我又想：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些看法，对揭发者说过的这些话，又可以统统承认下来吗？如果承认下来，那么，会给我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啊！那是要真的给我戴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株连母亲和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的呀！可是，如果拒不承认，如今证人证词俱在，军工宣队能够就比轻易罢手，让我逍遥法外吗？

……在令人恐怖的深夜里，我在草垫子上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于是，索兴披衣起身，在那间教室里踱来踱去。窗外，北风呼啸，还带着哨音；教室内，吴允曾先生躺在草垫子上，也一夜未眠，每隔一段时间，他便欠起身来对我说：“睡吧，睡吧，躺下来睡一会儿……一切等天亮再说。”可是，处在那种环境和心绪中的我，是不可能停止踱步思考的。

我预料，发生在燕园里的这场“清队”运动非同小可，像这样在政治高压下一个人揭发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再揭发另一些人，被揪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肯定会越来越多。因为，凡是有头脑、有正常思维能力的北大人，对这场运动都不免会有自己的看法，也决不会把这些看法只是闷在心里，不对自己的妻子、丈夫、最信任的亲朋好友进行交流。而这些在私人之间进行的思想交流、所议论的内容，假如全部被揭发、披露出来的话，那么，势必不仅在燕园，而且在社会上会牵连出许许多多的人，那么，这些人岂不统统要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划入反革命阵营中去吗？

我又向自己：凡是正常的人都有一颗正常的头脑，这颗正常的头脑不就是为了思考问题、判断是非、分辨“真善美”和“假恶丑”，从而支配自己的行为、采取行动的么？而现在军宣队这种“清队”运动的一系列做法，难道是想从根本上剥夺人们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吗？

我整整思考了一天一夜。

我最后决定：第一，那种违背内心良知和道德铁律、揭发他人的丑恶之事，我是决不能做的，至少，这种丑事到我这里必须中止；第二，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符合客观实际，是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正确结论，所以，必须坚持；第三，“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应该把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书写下来，公开出去，留给历史和后人，然后，就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免得承受我不想承受的、那些完全可以预料到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以及人身污辱。

做出上述决定以后，我见天已大亮，便推门走出房间，敲开红卫兵值班室的门，向他们索要了纸和笔，然后，回到房间坐下来，痛痛快快地书写下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大运动和“清队”运动的全部看法，毫不隐晦，淋漓尽致，竟一口气写了三十多页纸。写完后也没作修改，我马上交给了在红卫兵值班室里等候多时的618厂保卫科的李干事。记得当时我是这样对他说的：

“别人对我都说了些什么，我对别人又说了些什么，我都忘记了，回忆不起来。但是，我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我的交代材料。请你过目，并请呈转有关部门。”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洗手间方便。当我经过红卫兵值班室时，只听见那里突然间爆发出一阵喧哗，估计他们刚刚看完我写的交待材料。有两句非常刺耳的话很清楚地传到我的耳朵里：“这也太反动、太恶毒、太系统啦！对这个反革命分子必须进行严惩！”

### 第三章 逃离燕园，在北京电报大楼和中山公园

上交材料之后，我想就应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想自杀以前，还应该给母亲和亲友们留下遗信，而遗信还必须能够让她们亲眼看到。所以，我想首先要逃离燕园，去市里北京电报大楼写几封信——这些想法，都是我在写交代材料之前，早已盘算好的。

而燕园又是可以逃出去的。我逃离燕园之前，已经分析过对我有利的三个条件或因素：其一，我刚刚交出交代材料，专案组和红卫兵们决不会料到我在交出材料之后的第二天就逃出燕国；第二，东语楼里有两个楼梯，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红卫兵值班室设在一层的西头，西头是哲学系监管所，他们对一层西头的那几个教室和房间把守得很严，但是，往往不注意一层的东头——而我只要登上一层西头的那个楼梯，上到东语楼的二层或三层，再从二层或者三层东头的那个楼梯沿梯而下，会很容易地到达东语楼一层的东头，进一步走到东语楼的楼门；而这个楼门平日又很少上锁，这样，我就会凭运气走出监管所；其三，两个多月来，我已身无分文，所幸妹妹和弟弟探望我时，给我留下10元钱。这宝贵的10元钱，足够我逃离燕园后乘公交车、买信封、信纸和邮票用的了。

1969年1月4日是我一生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清晨5：30，东语楼内的一层一片漆黑，夜里值班的红卫兵有的还在睡觉，有的刚刚起床；监管所里的一两个犯人刚刚去洗手间洗漱；只有吴允曾先生早已醒来，轻轻地咳嗽，仿佛在警告我不要轻易妄动，然而，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我决心冒一次险。我在黑暗中穿好一件草绿色的绒里夹克，衣兜里揣好妹妹和弟弟给我的那10元钱，若无其事地走出房间，只见长长的楼道空无一人，只是洗手间那里露出些许昏黄色的灯光和一个洗漱人的身影。我蹑手蹑脚地踏上洗手间后面的那个楼梯，上到二层；二层更是一片漆黑，一派死寂。我来到二层东头的那个楼梯，顺着楼梯下行，到达一层的东头——只见一层的西头有个刚刚起床的红卫兵朝我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但是，他并没有发现我是个他应该看管的犯人，他扭头又朝西头的那个洗手间走去——于是，我加紧了行动脚步，拐个弯儿，飞快地奔到东语楼的门前。上天保佑！这个楼门果然没有上锁。

我一步跨出东语楼，回手轻轻把楼门关上，朝楼外东西两个方向望了望：只见东边的办公楼西南角的一个窗口，一道日光灯的灯光穿过一小片冬季里的晨雾，有几个蛾子在晨雾中飞舞；西边的北大西校门，只有半扇大门紧闭，而另一扇大门洞开。于是，我像一个早起锻炼身体的学生那样，边走边做扩胸运动，伸出双臂双手，又缩回双臂双手，我非常顺利地走出校门，再穿过蔚秀园，经过彭老总住过的挂甲屯吴家花园的那条土路，终于，来到一片极其开阔、黑黝黝、到处堆有零零碎碎雪堆的旷野里……西面的玉泉山上，有一两点微小的灯光忽明忽暗；东面的市区方向，有一小片湖水般荡漾的黄色灯火。因为是在冬季的清晨，天色还昏黑，我便朝东面市区那一片鱼鳞般闪耀着灯火的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去……

我终于获得自由了！一个人有自由是多么可贵啊！尽管是在严冬雪后的清晨，我只穿着一件绒里夹克，但是我不怕寒冷，一边奔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呼吸旷野里的新鲜空气——但是，我也到了即将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时候。想起“文革”以来的许多事情，尤其是想起这次被“政治审查”以来的种种遭遇，我感到太不公平，我有满腔的怒火、悲愤和委屈，一路上不禁痛哭流涕，热泪不断夺目涌出，潸潸而下，泪水把绒夹克的前胸打湿一片……

天色微明时分，我发现已经幸运地来到高中母校北大附中的所在地——黄庄，而且，一辆几乎无人乘坐的32路公交车，正朝黄庄车站驶来。我连忙跑几步，一脚踏进车门，随便找个座位坐下，用衣袖擦干脸上的泪水……32路公交车不紧不慢地向前行驶，我不时张望车窗外平日那么熟悉、现在变得那么可亲可爱、今后很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各色景致……公交车已经到了北京动物园，我从动物园下车，上了另一路公交车，倒车两次，终于，来到西单高高耸立的电报大楼。按照原来的计划，在电报大楼里歇息片刻，我要写几封信，留下遗言，把遗信发出，然后，自杀。

因为还是清早时间，偌大的电报大楼营业厅里只有两位营业员，一位在柜台后的一个角落里打盹，另一位低头整理邮件。我买了三个信封、几张信纸、三张邮票，随后，在大厅中央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旁，在一盏绿色台灯温煦灯光的映照下，站着写信：一封写给养育我多年、为我操碎了心的母亲；一封写给我心心相印、但不幸患有心脏病的未婚妻；另一封写给我的男友、情同手足的高中同班同学梁宝璟，他毕业于北京商学院，已经分配到云南楚雄，在一个工厂的职工子弟学校教书。

我边哽咽，落泪，边把三封信写就，把三张邮票也贴在三个信封上。可是此后，我却开始犹豫，不知应不应该就这样把三封信全部发出。我设想她们，尤其是我的母亲和病中的未婚妻，接到这种信以后的反应，可能继而发生的种种可怕的事情……反复思考后，我撕掉两个贴着邮票的信封，把写好的三个封信合叠在一起，都塞到那封寄往云南楚雄的一个信封里，把这封信果断地投入到信筒里——这时，营业厅的顾客已经多起来。我便走出电报大楼，穿过车水马龙的人行横道，开始在西长安街以南的人行道上散步，边走，边痛苦地思索……

是的，自杀前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再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我的心终于踏实下来，头脑也冷静多了。可是，现在，我究竟应该到哪里、以哪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呢？——而且，不结束自己的生命就不可以吗？要知道，生命是非常宝贵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保尔·柯察金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这些话，是我少年时代就背读过，一直引以为生活座右铭的。要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一去就不会复返的啊！况且，二十四岁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与“虚度年华”、“碌碌无为”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从少年时代便立下的雄心壮志，难道就这样烟消云散、化作一团泡影吗？就让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吗？这不是一种自我背叛吗？——然而，反过来，我又边走边想：此时如果不及时结束自己的生命，又有可能，不，一定会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一顶可怕的“反革命分子”帽子，身上戴着一副有形、无形的“反革命”枷锁，在这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必须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反革命分子”又怎样才能够有意义地度过一生，活得有些价值呢？

我像一个梦游者那样，在逐渐热闹起来的长安街人行便道上，边走边想，所有的人和物，统统视而不见；所有的声音，统统听而不闻，心中痛苦极了，也矛盾极了……

忽然，脑海中金光一闪，我停下了脚步。我想到，在这生是死的人生紧要关头，不可以只是由我一个人来决断，而应当听一听他人的意见。而这个人必须正派，是个具有社会常识判断力的普通人，而且，还必须是一个北大军工宣队料想不到的、即便抓到之后也奈何不了的一个普通人，于是，我想起了我在北大附中上高一时的一位同班女生郑金玲。当时，我和郑金玲都是班上的文艺委员，她在高考时，没有考上大学，在海淀区少年之家做音乐教师和舞蹈辅导员，“文革”后转为北京海淀区的一位小学教师。在“文革”中，她多次来到燕园，向我了解运动的情况。她为人真诚、冷静，或许能给我帮助。幸运的是，我还记得她所在单位的电话号码。于是，我又穿过车水马龙的人行横道，回到电报大楼营业厅，拨通了她的电话。

“是谁呀？”

“是我。”

“这么早就来电话，有事吗？”

“有事，要紧的事，非常要紧。请你赶快来西单电报大楼。我在营业厅等你，要快。”  
“就那么要紧吗？——好吧，我恰好一天没课，就去。”

一个钟头后，郑金玲便赶到。我情绪激动地向她诉说了事情的经过、目前的处境、生与死的心理纠结。她一直认真倾听，不置一语。我俩从电报大楼沿着人行道朝东走，一直走到中山公园，买了门票，来到公园以西的水榭，落坐在一条三面环有树木和灌木丛的绿色长椅上。

天气很冷，阴冷阴冷的，是一种侵入人的骨髓那种全身麻冷。郑金玲身穿一件长长、厚厚的紫红色棉猴，头上还裹着一条长长的、深红色的毛围巾。她见我只穿一件御不了寒的绒夹克，没戴帽子，光着头发，双耳和脸颊冻得通红，边说边浑身打哆嗦，便果断地拆下棉猴上的棉帽，侧过身来，把棉帽罩在我的头上。然后，她才坐好，开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肃口吻对我说道：“你的决定不对！事情也许还会有变化、有转机。他们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吗？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亏你还是个哲学系的学生，你不是坚信唯物主义吗？——你所说的那些‘反动思想’，目前很多人都有。我承认，我自己就有一些，可是，我就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

她忽然落泪，继而放声恸哭，又仰起头，遥望天空一点，若有所思地说道：“这场运动就是有问题，有许多许多的问题，让人无法理解：批斗，抄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这叫‘文化’革命吗？全国武斗成风，到处停工停产停业，社会秩序大乱，有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含冤而死的惨事发生啊！你们只在学校里搞运动，哪里了解社会上发生的那些无法无天、骇人听闻、使人不敢相信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总会这样折腾下去，是是非非总会弄清楚，总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一天。你一定要等待那一天的到来，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要想到死。要咬紧牙关活下去，就是开万人大会批斗你，把你投入监狱，带上手铐脚镣，你也要坚持活下去。别人能坚持，全国那么多人能坚持，你就坚持不下来，受不了了吗？”

可是，也就是在她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发觉周围的情况不对。我猛一抬头，突然看到我面前的正前方，站立着怒气冲冲的工宣队员李元和，而且，我发现七、八个哲学系师生已经包围了我们这个绿色长椅——原来，在我逃离燕园之后，吴允曾先生发现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房间，并没有作声，直到监管所在早饭前排队点名时，红卫兵们才发现我不见了踪影。此事立刻惊动了北大军工宣队的领导，他们下命令，要哲学系军工宣队停止一切活动，发动全系师生员工和军工宣队队员，迅速去燕园内外、颐和园、圆明园、香山、玉泉山、北京火车站、我的母亲家和我的亲朋好友家，总之，要立即到我可能躲藏或自杀的地方进行搜查搜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碰巧的是，恰恰在我独自一人在西长安街人行道上，似乎在悠闲地散步时，一个哲学系心理专业的68届毕业生到西单办事。当他看到一个正在接受“政治审查”的我，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长安街上，旁若无人地自由散步时，感到非常奇怪，蹊跷。他没有让我发现，更没有和我打招呼，而是转身飞快地去打电话，向系里告发……

就这样，我终于在中山公园里被捉拿归案，又被押回燕园。

#### 第四章 南阁一个月

自1968年8月军工宣队进驻北京大学以来，一场大规模的“清队”运动搞得有声有色，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以致搞得北大师生员工的多数人人自危，提心吊胆，不得安宁。当时，燕园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捧腹却又令人气愤的真人真事：历史系一个男生，因为白

天在报纸上乱写乱画，受到了军工宣队的批评，夜里在自己的寝室睡觉还愤愤不平，就在做梦时，下意识地说了“你们军工宣队有什么了不起的”之类的梦话，不料，恰好被走进这个寝室查夜的两个工宣队队员听到，马上，第二天就把这个说梦话的学生揪出，没过几天，凑齐了材料，就在东操场万人大会上展开批斗……

就这样，截止1969年年初，燕园里竟然忽啦啦一连串揪出四百多个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一个最可恶的，竟然在不得不交代自己的反革命思想之后，第二天就逃出北大，还企图自杀。军工宣队领导班子经过讨论之后认为，此事充分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他们认为：第一，这个“反革命分子”实际上是至死还要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和反动观点；第二，他是以企图自杀的方式方法挑战，向军工宣队示威；第三，所以，这个反动学生实属罪大恶极，必须严惩不贷。基于这样的一番分析考虑，他们便给北京市革命委会打了报告，把我的问题定为“敌我矛盾”性质，还提出，为了推动北大“清队”运动向纵深发展，必须把我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先在全校大会上批斗，然后投入监狱。据说，这个报告已经上报给公安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而谢富治也批准了，说就这样办了。

可是，就在这紧要关头，党的“九大”就要召开。任何人也没有料到，在“九大”预备会上，毛泽东亲自对北大的“清队”运动表了态。他说：北京大学在“清队”运动中搞了扩大化，抓出来四百个“反革命分子”，把“蚊子”问题夸大成了“大象”问题；他还说：“抓人容易放人难，难也要放”。此真可谓“天命靡常”——我的案情又发生大变化，果然出现了转机。

在那段时间，燕园里的人们议论纷纷，都在传说，原来的军工宣队因为犯了扩大化错误，准备从北大撤出；而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8341部队、以新华印刷厂工人为主的军工宣队就要开进北大，在毛泽东和江青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一场新的“斗批改”运动。

也就在两支军工宣队承前启后、相互交接和换岗的那段时期，燕园中自“文革”发生以来几乎所有被关进“牛棚”和监管所的领导干部、师生员工，都分期分批地被释放了；只有两个教员、一个学生没有被释放——这三个不幸之人都来自哲学系，显然，属于问题格外严重之列：一个是原哲学系的副系主任邓艾民；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后，到美国去了的郭罗基；那个不幸的学生，就是在下、本文的作者。这三个人都被转押至燕园里十分秀丽、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南阁”里。南阁和北阁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相对而立，中间只隔着一条幽静的小路，两个建筑物都呈黑褐色，都分楼上楼下两层，每层都有若干精致的小房间，过去，曾经是燕京大学阔小姐们居住的阁楼。到了这时，南阁便用来充当关押哲学系三个师生的临时监管所。郭罗基被关押在南阁楼上，邓艾民和我被关押在楼下，楼上楼下分别有红卫兵们值守。

关押我和邓艾民先生的那个房间，“文革”前是哲学系的系办公室兼资料室。在这个房间里，摆放有两张木床，两桌两椅，靠西墙立有几个大文件柜，柜子里装满哲学系的教学档案和资料，其中有马哲史专家黄楠森先生主编的《列宁〈哲学笔记〉注释》，还有一套《列宁全集》。我和邓艾民先生就在这个房间里朝夕相处，师生真可谓亲密无间，度过了非常难忘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邓艾民先生可不是北大哲学系里的一个普通教员。他仪表堂堂，身宽体胖，也带着一付金丝眼镜，人长得有派儿，相当帅气。他很高傲，凡人不理，只有对经过考察、自己信得过、认为品味相投的人，他才会放下架子，敞开心扉，与你进行推心置腹的深谈。他原籍湖南，西南联大生物系转哲学系毕业。上大学时，邓先生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出生于一个

地主家庭，曾经动员自己的母亲，变卖自家的田产若干，上交给组织，支持党的地下工作。建国后，他先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后调入北大哲学系任副系主任，因为任哲学系主任的康德专家郑昕先生是位民主人士，所以，哲学系的教学科研工作，实际上是由邓艾民先生主持。在哲学系相当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邓先生也是个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实力派人物。他在“文革”前北大“四清”运动中，本来站在反对陆平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一边，很为聂氏器重；但是，到了受到江青坚决支持的聂元梓在北大掌权的“文革”时期，邓先生因为看不惯聂氏一系列的所作所为，便与聂氏等人分道扬镳了——从此开始，聂氏等人便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把邓先生打成“漏网地主”和“阶级异己分子”，几次抄家、关进牛棚、批斗，甚至对邓先生多次进行毒打，对这位昔日的老战友展开残酷的“阶级斗争”和“专政”；乃至军工宣队进校以后，聂氏一伙因为仍然得势，所以，仍然死死地揪住邓先生不放，把他从别人的“牛棚”转押进新设立的监管所南阁里。

在南阁楼下那间系办公室兼资料室里，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邓先生多次泪流满面，对我讲述聂氏打手们对他实施的令人发指、可以载入史册的、典型的法西斯暴行。例如，十几个打手把邓先生围在一块空地的中央，这边几个打手几拳把他打到另一边，另一边几个人再踹几脚把他踹到另一边，拳头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地落下，金丝眼镜的镜片破裂，头部、脸部被玻璃片划破，鲜血直流，视物模糊；胸部、腹部被几只脚蹬踹，踹得他上气不接下气，疼痛难忍，人不知东南西北，两眼冒金星……如此这般，无止无休，直至他滚倒在地，昏迷、昏死过去。而类似的肉体折磨又不是一次，而是遭遇多次……

最痛苦的还是精神折磨。在与邓先生同室相处的那一个多月，我几乎每天夜里都睡不好觉，被他在睡梦中的呻吟声和惊叫声惊醒。有许多次，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令人恐怖的声音，于是披衣下床，把他唤醒，劝慰一番，接着二人上床再睡。有一天夜里，邓先生不知为何，在床上放声大哭，那哭声忽高忽低，十分怪异、瘆人，令人毛骨悚然，以至惊动了值班的红卫兵，前来连续敲门。我赶紧跳下床，把邓先生叫醒，一再地说：“老邓，老邓！别这样！别这样！快醒醒，快醒醒！”就在那天夜里，邓先生坐在床上，双手拉着我的一只手，抽抽噎噎地说道：“对不起，真对不起——我是觉得为革命奋斗这么多年，太不容易，太不容易……我看不到前途，两眼一抹儿黑……我自己倒没什么，50岁的人了，但我还有两个儿子，他们还小，他们没有罪过。可是，他们现在既上不了学，又参不了军，就那样耽误着，耗着……是我连累了他们……”那天夜里，我们握着手一夜没睡，直到天明。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邓先生很爱他的两个儿子，他处事也谨慎、老练，考虑问题周到、细致，有时，到了过分的地步。举个例子能够说明问题：

在南阁时，我们都是手拿着饭盆儿，到未名湖北岸的一个教工食堂打饭，身后有红卫兵跟随。有好几次，我发现在教工食堂以东的一片假山上，有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脑门儿和脸蛋儿长得圆圆的，很像邓先生，总是站在两块山石之间探出身子，目光忧愁、可怜巴巴地朝我们这个行进中的队伍张望。接连好几天都是如此。而邓先生看到那个男孩后的反应也奇怪，只要远远地看到那个男孩，邓先生就马上缩起身体，低下头去，一副小心翼翼的羞愧样子。我就逗弄老邓，拿他开心，在队伍中小声说：“老邓，老邓，快看，快看呀！你儿子又来看你来了——来一趟不容易，你应该抬起头来。”而邓先生每次听到我这样说时，都拒不抬头，同时，紧张而严肃地小声回复我道：“去你的，别胡闹。那不是我的儿子——真的不是。”多年后，我从河北衡水考回北大，做1978届中哲史研究生，除张岱年先生等几位导师外，邓艾民也是我的导师。有一次，在邓先生家里闲聊，回忆起在南阁度过的那段日子，我忽然想起未名湖畔假山上的那个小男孩，于是质问他道：“老邓，老实回答，当时假山上的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儿子？”邓先生听后，起初一愣，而后，又开怀大笑，不



好意思地回答：“你的眼睛真毒！——那确实是我的儿子，是家里的老大。可是在那种时候，我不敢认，怕父子一旦相逢相聚被红卫兵发现，发生不测之事，儿子受到牵累……。”

1969年1月到2月，在与邓先生共处南阁的那些日子里，窗外经常下雪，而且，每隔一些日子，窗外便传来一阵阵敲锣打鼓声和人群的欢呼声、口号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那是因为毛泽东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军工宣队带领北大师员工员们在庆祝。有时，我和邓先生从窗内可以看见抬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牌匾的游行队伍。

自从被关进南阁以后，红卫兵虽然命令我们继续交代问题，只准我们看《毛选》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但是，他们看管得并不严，我们的时间也富裕。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我就翻阅文件柜里的各种教学资料和《列宁全集》、黄楠森先生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有不懂的地方，就问邓先生。邓先生虽然搞的是中哲史专业，但对马哲、西哲也很熟悉，又因为主抓过哲学系的业务工作，所以，对系里无论是年老、年轻教员的业务特长和学术经历都门儿清。他曾经连续几天，给我做过这方面的情况介绍。这是更高级的学问，在一般的课堂上学不到。在中哲史领域，他推崇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先生，认为这三位都是大家，有真学问，为中哲史这门学科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后来，我考回北大，硕士论文的题目与胡适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受到邓先生的影响。

当然，作为那个时代、那种社会环境中的一个意识形态工作者，一个领导干部，邓艾民先生对于现实的政治问题也颇有兴趣和独到见解，只要得空，他就无所顾虑地与我探讨有关问题。他对我经过独立思考，能够形成有系统的“文革”见解很欣赏，认为这很不容易，对我的观点也表示基本赞同。可是，他几次直逼我的双眼，严厉地说：“今后你少参与政治！”他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太真诚，性格太实在，不是个搞政治的料儿——知道吗？搞政治也需要有一定的天赋。搞政治与搞学术不同，各有各的规律……。”

我记得在南阁时，邓先生有些政治观点还有点儿超前。例如，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都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民族、地理环境和时代条件有关，不是人为任意设定的；而西方世界并不像我们的报刊上宣传得那样差劲儿，英美治国多年，有不少正确的治国经验，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他还多次说过，他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这样一个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他很早就立志“立言”，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但另一方面，他又想“立功”，身不由己地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而结果并不妙。所以，他劝告我，如果我的问题将来能够得到解决，还是要搞学术，少搞政治，要像胡适所说的那样：“首先要把自己造成个‘器’”，否则，什么也谈不上。邓先生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也有矛盾：一方面，他对这场“文革”运动抱悲观态度，不知道中国要往哪里去；但另一方面，他又坚信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必然规律，从长远看，人民群众确实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历史必然规律是任何个人也改变不了的。他对我这样说过：“荀子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的话才是客观真理。”

正是在与邓艾民先生同甘共苦的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在一个窗外大雪纷飞的晚上，我写了一首《钗头凤·在南阁》，给邓先生过目，受到他的赞许。那首词是这样写的：

青剑冷，愤血凝。漫漫雪夜听远铃。  
史书吼，笳鼓竞。沉思良久，心自不平。静，静，静……  
江绸封，山危倾。旗舞冰飞风尚猛。  
多痴情，实非病。一行南雁，万里群莺。醒，醒，醒……

（未完待续）

~~~~~

【痛定思痛】

反思文革是全社会的救赎

• 田文昌 •

（作者简介：田文昌，1947年生于吉林，法律学者、律师。）

人类历史上所仅见的、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距今整整五十年了。在文革发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已被逐渐淡忘了的这段历史又开始受到关注：回顾、反思、忏悔、留恋、批判、赞扬，甚至鼓吹再来一次文革的声音都已经出现。这种现象表明，半个世纪虽已过去，文革的阴风却并没有消散。究其原因，应该说，是由于这一场制造了人间惨剧的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

面对今天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和种种思潮，人们不禁要问：文革彻底结束了吗？

按照通常的理解，至“四人帮”垮台之日为止，作为“十年动乱”的文革已经宣告结束。然而，作为一种精神遗产的文革流毒，事实上，直至今日也并未彻底肃清，这正是文革悲剧的一种延续，而这种延续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隐患！

曾几何时，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不仅甚嚣尘上，而且还得到不在少数人的千呼百应。更有甚者，直到今日仍不时有人借题发挥公然鼓噪文革重来，而且还有人响应。而在这种表象之后，更值得深思的是，在几代人的观念中，已经不同程度地打下了文革式思维的烙印。所以，宁左勿右、薄情寡义、口是心非、藐视法治……这些在文革中形成和放大的、与人类历史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相背离的思维方式，多年来，像一个魔咒，一直在时隐时现地禁锢着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以至于直到今天，许多人甚至是深受文革之害而痛恨文革的人，还深陷于被洗脑的痴迷之中，仍然不能彻底跳出文革式的思维模式。

这说明，文革虽然在形式上宣告结束了，但是，文革的阴魂还未散！文革在几代人的思想深处还没有彻底结束。

文革五十年后的今天，作为文革亲历者的最后一代人，已经年近古稀开始逐渐离世了，后人们将不知“文革”为何物。所以，反思文革、清算文革，这将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机会。虽然，历史常常是由后人书写的，但是当代人书写的历史，才是最真实、最有价值的。在当代人有能力书写历史的条件下，就不应该将这个使命留给后人。

更重要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反思文革、清算文革，直接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方向性选择！是回到文革，再现文革？还是否定文革、防止文革复辟？不仅是一种制度性选择，而且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选择。概言之，只有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彻底否定文革、清算文革，使人们深刻认识到文革的历史性危害，才能使中国防止重蹈文革覆辙的历史性悲剧，摆脱民主法治道路上的思想障碍。

因此，反思文革，是我们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是对全社会的救赎。

文革究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 文革中没有赢家

文革十年，全面内战，整个中国就像一个飘忽不定的大战场，混战之后，没有赢家，这正是文革最大的悲剧所在。

文革开始时，首当其冲被迫害的是革命老干部，即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迫害之深，令人发指，其范围之广，几乎无人幸免。接下来，被打击的对象就扩展到一切“牛鬼蛇神”。这些“牛鬼蛇神”的范围不断扩大，先是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分子）坏（坏分子）右（右派分子），后来又加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知识分子。这些人遭受迫害的程度和范围，更是升级到了没有边界的恐怖地步！在当时盛行的“红色恐怖”的口号之下，这些人被视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随时都可能成为被“革命群众”任意处置的专政对象。因知识分子被排在最末的第九位而被称为“臭老九”境遇比前八位略好一些。但是，如果说前面的八类人还有一种带有贬义性质的特定身份，而对于知识分子则是不加区分的，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里，只要带戴上了知识分子的帽子就被打入到坏人堆里了。而遭受迫害最惨烈的，是那些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著名学者、高级知识分子。

从数量上看，这些人毕竟还是少数派。因为，按照当时盛行的95%与5%定律的划分法，在任何时候任何群体中都是95%是好人，坏人只占5%。但更可悲的是，在那个打倒、斗臭了那些少数派的95%的阵营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也同样没有好下场。

文革是靠发动中学和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小将点燃了第一把火和冲锋陷阵起家的。然而，当他们在狂热和盲目中不计后果地砸烂了一个所谓的旧世界之后，却未能迎来一个理想境界中的新世界，反倒成了与那个旧世界同归于尽的殉葬品。到头来这些小将中的大学生们荒废了学业而被草草分配到基层和边疆，变成了一个个可以任人摆布、随意安插的螺丝钉。而更多的中学生则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了一种特殊群体——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如今，这些在蹉跎岁月中苦苦挣扎了大半生的“知青”们已陆续进入古稀之年，名副其实地成了被毁掉的一代人。

文革中的造反派，是打倒“走资派”，向旧势力开炮的激进分子，他们与红卫兵的命运相似，开始时是大革命的宠儿、弄潮儿。到头来，又变成了被整肃的“三种人”。随着文革的宣告结束，变成了历史的垃圾。

在文革中最为得意、最为嚣张的是林彪、四人帮分子等一批政治野心家，他们害人无数，但最终被历史彻底抛弃。

至于作为社会基本力量的工农兵大众，虽然戴着领导阶级和社会中坚的桂冠，却始终处于被运动、被愚弄的境况之下，在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上，承受着贫困生活的压力。这些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虽然没有经历过天翻地覆的浩劫，却也无不在人人相残的恐怖气氛中战战兢兢，不敢乱说乱动。

十年动乱就像一场噩梦，在这个梦境中，无论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几乎每个人都扮演着各自不同的悲剧角色。而像张志新、遇罗克等一些“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极少数精英分子，却只能被当作疯子从精神到肉体加以彻底消灭。

当人们醒来后才发现，在这种互害模式的恶斗之后，到头来人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人能够幸免。

这样的一场浩劫，难道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肯定、怀念和向往吗？但可悲的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有些人至今还没有真正地清醒过来。

◇ 文革切断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

中国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遗产举世瞩目。而文革中破四旧的号召一声令下，不计其数的历史文物和文化遗产统统灰飞烟灭，幸存者寥寥无几。较之文革中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毁灭性的危害后果更加可怕，因为被切断的历史是无法复原的。如果说作为物质文明的历史文物尚可复制，而作为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则是难以接续的。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切割和颠覆，撕裂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在否定历史真实性的同时所发生的一系列系统性篡改和造假，更使得国人对历史的真相变得无所适从。时至今日，很多人对中国文明史的了解还远不如对西方文明史的了解，甚至会用是非颠倒的价值观去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他们无法了解真相。在那些文明史远不如我国悠久的西方国家，人们经常会津津乐道地回顾和赞美他们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会谈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美国高等法院墙上的浮雕中，孔子的雕像也被排列其中。可是，我们却只能以抵制的态度去否定自己国家的历史。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成就之外，似乎一切人文科学都只能做作为被批判的糟粕而加以摒弃。文革中，除了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等政治书籍和鲁迅等少数革命作家的作品之外，绝大部分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成为禁书。中国文化成了一种无本无原的崭新的革命文化。

文革五十年后的今天，文革前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人，也就是真正了解和可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一批人，已经成为历史。而作为亲历文革的年轻一代，他们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者，同时也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也即将成为历史。可悲的是，这一代人本应成为承上启下的传承者，却由于文革的原因而陷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误区而难以担负起传承的责任。

接下来，作为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们，则只能在被切割、扭曲、篡改、伪造后的碎片化信息中通过时光隧道去寻找过去的世界。

今天，当我们开始反思，开始试图修补这些被撕裂、扭曲的文化遗产时，就会沉重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已经被支解得面目皆非，真伪难辨！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明史的切断，犹如割断了中华民族的血脉，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致命性伤害！

◇ 文革激发了人性中的阴暗面

文革的爆发，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并诱发了人性中潜在的各种恶性，使整个社会处于好人也会变成魔鬼的魔咒之中。在盲目的狂热和残忍的高压形成的互害模式中，亲情、友情被彻底毁灭。有些红卫兵小将可以残忍地折磨、羞辱直至把他们的师长活活打死；有些造反派可以对所谓的走资派用尽极刑而后快；有人为了伪造证据陷害他人，可以创造出惨绝人寰的刑讯手段，并在虐待他人中寻求快感！在武斗中，人们可以对昔日的工友、朋友

和同学毫不留情地刀枪相见；子女可以揭发、批判、斗争甚至殴打父母，夫妻可以因观点不同而顿时变为仇敌；为了报复、泄愤和利益争斗，或者为了自保、讨好，可以编造事实诬陷他人……先前的害人者，又可以成为后来的被害者，先前的被害者，也可以成为后来的害人者。更加可悲的是，一些害人者往往会对自己的恶行冠以革命的名义，甚至在内心中也确信自己的行为充满革命的正当性。不夸张地说，文革中已经分不清好人与坏人的界限，多数人处于自我迷失的困顿之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80年代初期，国内曾经上映过一部德国影片《屠夫》，反映纳粹德国的青年纳粹党徒们迫害犹太人的情景，其手段残暴无所不用其极，暴露出人性的扭曲。文革中的许多场景，正如同该影片中场景的再现。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揭示出人性的多重性与脆弱性，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激发人们的善性而遏制人们的恶性。一个恶劣的社会环境，则会激发人们的恶性而泯灭人们的善性。古今中外，概无例外。

文革后的今天，有人开始反思，有人开始道歉，有人尽管极力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开脱和辩解，但内心深处却难以无动于衷。重要的是，每一个文革的亲历者都应当反思自己的行为，无论当时做过什么，都应当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找一找支配自己行为的深层原因，对比一下自己在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思想和行动的不同变化。想想为什么会在文革变得理性缺失，行为失控。即使那些在文革中能够真正做到独善其身而问心无愧者，也同样需要反思。反思的目的，不是为了追责，也不是为了自责，而是为了在总结教训中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更是为了使全社会从文革的魔咒中彻底摆脱出来。

◇ 文革毁掉了不止一代人

文革自1966年开始，至1976年结束，虽然仅历时10年，其影响的范围却跨越了好几代人。

文革中无论是受害最深的中老年，还是当时涉世不深的大、中、小学学生，直至文革中出生的新生代，统统都无法逃避文革风暴的“洗礼”。在那种疯狂无序的大环境中，比肉体消灭更悲惨的，是对灵魂和思想的亵渎。

是非的颠倒、价值观的扭曲，使许多人在自我迷失中已经失去了理性。在疯狂的造神运动中，人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独立的判断能力，为了虚妄的崇高目标，人们可以自欺欺人地生活在心照不宣的谎言之中。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连善良和同情心都会被上纲上线而遭到彻底批判，无情无义的阶级斗士却成为做人的楷模。

在这种疯狂的洗礼中，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自愿或者不自愿地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做人的原则。假话、大话、空话成了人们表达和交流的常态，人人生活在言不由衷的虚幻世界之中……这种摧残人性的恶果，不仅体现在文革当时的环境中，而且还延伸到文革后的若干年。文革中遭到迫害的幸存者，有些人不仅毁掉了健康，毁掉了前途，而且毁掉了人格，毁掉了思想，有很多人已经陷入永远的迷茫中无法自拔。而文革中曾经叱咤风云，因打碎旧世界而踌躇满志，继而又被赶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一代，有些人在感叹自己坎坷经历的同时，却还会在苦涩的回忆中捂着伤口唱赞歌，似乎要在那种已逝的噩梦中找回昔日的辉煌。至于那些曾经获得既得利益而中毒更深者，则一有机会就会不失时机地跳出来为文革招魂。而更为可怕、可悲的恶果则在于，在后文革时代的今天，怀念文革、鼓吹文革者还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并未经历过文革的年青一代。

为什么会有这种乱象？为什么文革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其实，这正是文革造成的恶果所致。文革不仅毁灭了一批人的肉体，而且玷污了更多人的灵魂。肉体的消灭是一时的，灵魂的玷污则是长远的，它可以继续扩散、发酵和传染。所以，文革中在肉体上遭到毁灭的仅仅是一代人，而在精神上被毁掉的却远远不只一代人。

◇ 彻底清算文革，才能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文革以“四人帮”的垮台为标志宣告了形式上的结束，继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但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对于文革的恶果、遗毒及其成因，尚没有进行全面彻底的反思和清算。

在文革五十年之后的今天，清算文革的目的不在于追责，而在于分清是非，实现思想观念上的拨乱反正。

首先，对文革的成因必须作出深刻的分析。文革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一触即发，顺势而起且越演越烈，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源于中国社会当时特有的生态环境。关于这种环境与文革爆发的内在联系，至今并没有作出深刻的解读和反思。遗憾的是，五十年来，这个话题似乎一直成为无人触及的禁区。而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病因不除则病痛难消。如果不能深刻解读和反思文革的成因，文革复辟的隐患就不能彻底消除。令人忧虑的是，这种迹象已经有所显现。

其次，对于文革的危害性必须客观、全面地做出总体评价。“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之类的抽象定性，尚不足以使人们认识到文革危害的具体后果和严重程度。时至今日，亲历文革的当事者已经陆续离世，后来者已经不知道文革为何物。有些人认为文革中的某些事件是危言耸听，甚至对文革时代还会存在一种憧憬。这种认知断层现象已经发出了危险信号：反思文革，已经迫在眉睫。只有对文革的危害充分揭露，客观评价并勇敢地昭示天下，才能使人们痛定思痛，牢记文革的教训而不再重蹈覆辙。

其三，清算文革必须彻底，不能态度暧昧。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是人类文明史上所仅见的浩劫，不存在任何积极因素与合理成分。只有彻底否定、彻底清算，才能肃清流毒，消除危险。迄今为止，之所以文革遗风尚在，文革思维尚存，其根源就在于对文革清算的不彻底，致使一些人至今仍然不能摆脱文革式思维的影响和束缚。中国社会对法治的认知，是通过文革的惨痛教训换来的，但几十年来法治进程中的一波三折，却反映出文革式思维的痕迹仍然时隐时现并没有彻底根除，以至于在很多问题上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实的种种乱象司空见惯、屡见不鲜。这种乱象削弱了人们对法治的信念，甚至会引导人们在困惑之中试图回到文革去寻求出路。

面对当前社会风气腐败的乱象，有些人甚至会唤起对文革的怀念，试图用文革的方式去整治贪官，这恰恰反映出由于没有彻底清算文革所带来的认识误区。必须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文革中貌似大民主而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并不能带来一个国泰民安的清平社会，只能是一个万民涂炭的悲惨世界。无论是防止腐败还是保障人权，唯有民主与法治才是人间正道。而这个结论只有在对文革彻底清算之后才能令人信服。

清算文革是全社会的责任，而更主要的是文革亲历者的责任。因为这些人对文革有更深切的体会和更深刻的认识。文革中，不同地位，不同境遇的人都遭遇过不同的事件和做过不同的事情，无论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或者既是害人者也是被害者，抑或是旁观者，都在不

同程度上卷入或见证了那一场自我迷失的乱象。这些人更有责任以切身体会向世人展现并说明文革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文革爆发距今已经五十年，结束已经四十年，但在人们思想深处和记忆之中，文革并没有彻底结束。文革的遗风还在，遗毒尚存，文革的阴影还盘旋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反思文革就是要彻底清算文革，只有彻底清算文革，中国社会才能真正走出文革的阴影，才能避免重蹈文革覆辙。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